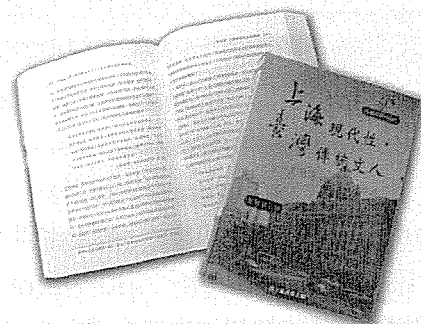


現代性幻象：評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

The Phantasmagoria of Modernity: Book Review on *Modern Shanghai/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i: The Chasing and Disillusioning of Cultural Delusion*

林淇瀋

臺北教育大學



日治時期臺灣與中國在政治上是一種國際關係，在文化和民族認同上則摻雜著相當含混、猶豫並且曖昧的祖國情結。當時的臺灣文人，無論新舊，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都抱持著濃厚的關心。在新式文人部分，由《臺灣青年》為首的臺灣民報系，受到胡適、陳獨秀領導的中國白話運動影響，而有黃呈聰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黃朝琴撰〈漢文改革論〉，其後張我軍更以五四新文學革命為師，提倡中國白話文可知。舊式文人深受中國漢學影響，長久浸潤於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其祖國情結較諸新式文人當然更濃且更厚。然則，歷來臺灣文學研究較少針對臺灣舊式文人的中國文化認同與祖國情結有所耙梳，因此使得我們對於新式知識份子，如何在文化上尋索臺灣前途知者較多，對於舊式知識份子如何在日本統治的文化圈中，尋求與中國新文化連結的心路旅途，則知者有限。這毋寧是臺灣文學／文化研究的一個令人遺憾的缺口。

本書將論述焦點集中於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與周定山等四位舊式知識份子之上，透過他們的作品，企圖澄明他們在殖民統治下如何努力通過對中國新文化的認識，尋求突破文化認同困境、重構個人文化認同的過程。著者以相當細膩的文獻分析

方法，逐一耙梳四位性情各異的舊式文人的著作，通過他們與當時中國上海〔及其展現的現代性〕接觸之後產生的文化認同的轉折，以及在這轉折過程中四人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反應，因此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理解：在新式知識份子進行臺灣文化的狂飆運動的年代，這四位舊式文人所代表的為數甚多的臺灣傳統知識界的苦悶和焦慮。唯有釐清一九二、三〇年代這個較少被注意的片段，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研究才可能更加完整。這是本書值得注目、重視的意義所在。

其次，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祖國情結的存在乃是相當普遍的事實，從無分新舊的知識份子到一般臺灣民眾，面對殖民的日本帝國，在政治上雖然不能不接受日本做為國家認同對象的事實，文化和民族認同，則仍舊以中國為「祖國」。而當時臺灣與中國交通往來方便的滿州、北京、上海、福建、廣東等地，更是不乏臺灣人〔特別是知識份子〕足跡，通過與祖國文化的接觸，比較日本文化以及重建中的臺灣文化比較，他們在跨越傳統與現代、中國與日本的時間、空間之中，如何面對做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思考臺灣的將來，選擇或重尋自身的認同對象，更是研究臺灣被殖民史相當重要的課題。本書以當年的中國上海為論述場域，比較四位傳統文人行踏上海之後的心境、省思以及抉擇，因此也可供我們了解臺灣經驗與上海所代表的現代中國經驗交會時，這些根柢上傾向中國傳統文化的舊式知識份子的認同衝突。這是本書在研究貢

林淇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通訊作者：林淇瀋，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E-mail:hylim@ms21.hinet.net

獻上不可忽略的一個部分。

著者指出，遺民意識與文化鄉愁，是促成當時舊式文人往赴祖國追尋文化認同的內在原因；外緣因素，則來自當時臺灣重要媒體〔如《臺灣民報》系、日人辦的《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等〕傳播的上海文化資訊，引發他們對當時上海所代表的中國「現代性」的文化追尋——這一見解，反映在林癡仙等四位舊式文人行踏上海的詩文之中——而其行踏之後則各有不同心境呈現：林癡仙反映的是漂泊思鄉的愁緒、自我身世的慨歎、留連酒館的遣悶、紛亂時局的慨歎；連雅堂是對上海新象的觀察和紀錄、對國民黨的民族情感投射、對當時政黨、婦女問題的關注；洪棄生表現的是透過上海見聞的歷史考證和詮釋，寄託了臺灣傳統文人的眼中的中國圖像；周定山則是表現了身為日本國民卻心繫祖國的兩難，以及目睹日本侵略中國的戰時景象的悲傷。這些都來自四人的詩文紀錄，相當可信，且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因而讓我們得以理解二、三〇年代的歷史真實，這也是本書做為史料見證的可貴之處。

不過，著者的研究結論則仍有商榷空間。著者認為，四位舊式文人最後都因為「文化認同的追尋無法滿足」是「他們與上海相遇之後的最大難題」，「現代化」的上海無法負擔他們先前的文化認同，使他們轉向瀏覽歷史、整理國故、編寫臺灣文獻……等工作，「透過對中國、臺灣歷史記憶的召喚或重組，不但降低認同失落的焦慮，族群邊界也因此被強化，臺人的群體意識也得以維持與凝聚」。這個總結式的看法，失於籠統，且將四位情性不同、文化認同深淺不一的舊式文人踏履上海之後的不同反應加以一概而論，有論述過當之虞。如果著者能將四位舊式文人的心境反映歸納為四端，則林癡仙的漂泊思鄉、連雅堂的政治投射、洪棄生的思古幽情、周定山的民族情感，未嘗不能象徵當時舊式文人接觸既具中國傳統性又具全球現代性的上海的四種可能模式，在詮解臺灣舊式文人的文化認同現象上可能會比較周延，而對於四人回臺之後到底持續舊有的祖國認同？或者轉向臺灣文化的重建？或者無所作為，繼續逃避？也才可能

清楚分析。這是本書尚待釐清之處，也是著者研究「文化認同」的提問假設未見解答之處。

關於「現代性」，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說法，意味的是「瞬間性」（ephemerality），也就是以新事物取代現有的狀態，與幻象（phantasmagoria）無異，可視為資本主義的驅力（capitalist drive）。¹近年來以「上海現代性」為議題的臺灣文學研究日增，可惜多半視「現代性」為進步的象徵，忽略其所產生的文化疏離現象。本書以「上海現代性」為名，若能從現代性的本質切入，則當能了解二、三〇年代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舊式知識份子對於現代性並不陌生，當時的臺北、臺南、東京，上海的現代性最少是同步受到資本主義影響而醞染的。林、連、洪、周四人的文化認同若有失落或困境，不在於面對現代性，而在於面對當時祖國文化的與民族的想像出現重大差距，而生失落、幻滅之感。以此解釋他們四人心祖國文化夢的幻滅，或許更能合理而清晰地點出癥結所在。

¹ 詳參Susan Buck-Morss, *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9), 81-82.